

第十六次中国逻辑史全国 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 琦

中图分类号: B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6644(2016)05 - 0118 - 03

作者李琦,女,汉族,贵州贵阳人,硕士,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助教
(贵州 贵阳 550025)。

2015年11月28日至29日,第十六次中国逻辑史全国学术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隆重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贵州民族大学、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与贵州省逻辑学会联合主办,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民族大学逻辑、文化与认知研究中心和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处承办。来自全国三十多所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其他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近30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内容涵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多个领域。

关于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论,孙中原教授强调方法是宗旨、目的、方向、途径、手段、工具和程序的统称,提出中国逻辑史研究应该借鉴库恩科学发展模式论、希尔伯特元理论、塔尔斯基元语言和傅伟勋创造性诠释学理论,坚持“中西互释、比较研究、融会贯通”。陈道德教授认为名辩学所说的“名”是能指和所指相互结合的语词符号,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符号学对符号和语用推理给予了充分研究,因此相较于传统形式逻辑,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张连顺教授将中国逻辑的起源置于中华文化的起源这一问题域中,从原始刻画、原始绘画和仓颉造字等方面对中国逻辑的起源进行了追溯,初步显示了利用考古材料来深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可能性与意义。董英东副教授主张在一种语形、语义和语用兼顾,推理研究与哲学研究并重的多元逻辑观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强调这种研究应该与文化相结合,通过动态考察民族语言的发展变化来发掘蕴涵其中的逻辑因素。

在中国古代逻辑研究方面,针对以没有研究“必然地得出”而否定中国古代有逻辑的观点,刘明明教授从古代思想家对推类必然性的认识、“形式结构”与“必然地得出”的关系以及推类“必然地得出”的机理等方面对其进行了反驳。田立刚教授提出,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的最重要代表,墨家逻辑是以论辩为对象,以求当取是为目的的非形式化的论证逻辑。“以类取,以类予”不是推理形式,而是论辩活动中所采取的论证方式;有关“效”的论述揭示了三段论的

基本原理。韩国建副研究馆员以《小取》“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为例,分析了“是而然”中的词项与命题问题,认为“是”与“然”是两个命题之间是生长、扩展的关系。相异于通常从类比角度来解读墨子所谓的“譬”,博士生林泽楷以论证结构为视角对逻辑学意义上的“譬”进行了探析,认为墨子所说的“譬”具有论证说理的功用,在设譬以说理时既要考虑譬的价值属性,也要避免轻易被驳难。硕士生钱爽对现有关于《小取》之“侔”的种种解说提出了商榷,认为“侔”有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三款;依据三种形式,又有盈之侔、阙之侔与迭之侔三种,其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由经验归纳而得。此外,博士生廖晨从广义论证的观点出发,总结提炼了《鬼谷子·捭阖》的说理规则,并结合《战国策》中纵横家的游说实例,阐述了“捭阖”在论证的具体作用。吴克峰教授考察了基于易的中医原创理论范式的逻辑特征与逻辑系统,提出中医原创理论范式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天人关系的易学,后者既涉及对自然界和人体生命运动的考察,也包含对这种考察的考察,即形成了以推类为特征的逻辑理论。曾昭式教授从《瑜伽师地论》文本出发,探讨了因明的范围、性质和作用,认为应着眼于文化对逻辑的制约,把因明视作一种不同于西方逻辑的逻辑科学,是一种基于佛教内明但又有别于内明的论证理论。

中国近现代逻辑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点。翟锦程教授考察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形成过程,认为西方传统逻辑作为研究中国逻辑的观念和方法虽有孙诒让的启蒙,但并未得到直接回应,而后受日本学界的启发才逐步在中国学界有所反响。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是20世纪初期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探索者,其后有关中国有无逻辑、中国逻辑思想发展过程以及中国逻辑思想的典型代表的讨论等对20世纪早期中国逻辑思想体系的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张斌峰教授从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梳理了严复的逻辑文化观,指出正是由于严复对西方逻辑学说的系统译介才使得西方逻辑逐渐与中国传统逻辑相融通,并成为中国逻辑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严复自己的逻辑观,开创了融合中西逻辑思想的先河,也为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跨文化对话与交流提供了思想源泉。刘新文研究员主要围绕金岳霖的第一篇逻辑论文“Prolegomena”以及相关文献,从逻辑基础问题的角度,主要是“逻辑中心困境”的角度提炼出“金岳霖论题”,试图为理解金岳霖的逻辑理论和哲学体系提供一个更为恰当的理论起点,并阐释该论题在当前逻辑基础问题研究中的现实意义。张耀南教授从驳黑格尔之辩证法、论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异和驳唯物辩证法及其“经济史观”等方面阐述了张东荪的逻辑思想,并进一步分析了张东荪批驳唯物辩证法的理由,强调其与欧西哲学家驳“自然辩证法”角度不同。晋荣东教授考证伍非百在1916年率先把“名辩”一词引入先秦名学研究,梳理了他对名辩之学的内容及其组成的论述,以及对先秦名学(形名之学)的派别划分与要旨勾勒,认为相较于以“名学逻辑化”为主导方法的旧名学研究,伍非百的工作可以为当代新名学的开拓提供可能。博士生聂洪青评述了杜国庠在公孙龙子的哲学与逻辑研究领域的得失,认为其得在于立足文本与文化背景的本土化解释,其失在于立足西学对公孙龙子哲学与逻辑的评判定位。此外,何杨博士梳理了现代逻辑(包括经典逻辑和非经典逻辑)在20世纪前期(1900~1940)中国的译介情况,发掘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史料。钱耕森教授以其自身经历为主要线索,分享了珍贵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贵州逻辑教育史料。郭桥教授分析了新时

期以来主要的大学逻辑教材,建议将名辩学作为大学逻辑教育的组成部分。

除了围绕上述几个领域进行学术交流,本次研讨会的一个亮点就是对如何深化“逻辑与文化”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早在2010年召开的“回顾与前瞻:中国逻辑史研究30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刘培育研究员就提出,应该“从对中国古代名辩学、逻辑学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研究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类型。这些研究要力求增强对现实的作用。”在本次研讨会上,硕士生张雨从着眼于逻辑与文化的关联,从广义论证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学与民族志、案例分析、田野调查的方法,将彝族人的论证模式置于有关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重建,对于扩展中国逻辑研究的类型与内容、深化对“逻辑与文化”论题的讨论,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今后一段时期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设想,在2013年召开的中国逻辑史第十五次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刘培育研究员、翟锦程教授和张学立教授就提出应重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在本次研讨会上,刘培育研究员再次强调要高度重视中外学术交流,使中国逻辑史研究大步走出去,为此既要从整体上、宏观上梳理中国古代逻辑的总体特征与理论成果,也要深入研究名辩学、易经和因明这三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名辩学作为中国古代逻辑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重点。在回顾与总结过去几年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成绩与问题的基础上,张学立教授提出今后一段时间要以文本为基础扩展研究内容,从中华文化宝库中发掘研究类型,以丰富知识背景为前提运用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推陈出新加快国际化研究进程。王路教授指出,中国逻辑史领域的专家学者近几十年来挖掘的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今后应在此基础上放宽视野、推陈出新、丰富知识结构,以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综上所述,本次研讨会在如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取得成果,为进一步推进中国逻辑史研究创造了条件:第一,强调中国逻辑史研究必须加强国际化,在深化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的同时,把当代中国学者有关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积极成果推向国际学术界;第二,展示了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对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形成过程的梳理、对“金岳霖论题”的提炼与阐释等成果尤其为与会学者所瞩目;第三,扩展了中国逻辑研究的类型与内容,以对少数民族论证模式的分析与重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为深化对“逻辑与文化”论题的讨论指出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方向。

责任编辑:陈刚

Review of the 16th 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ogic History

LI Qi
